

· 中国禅学研究系列丛书 ·

《六祖坛经》 研究

第三册

广东新兴国恩寺 编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目 录

(三)

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

——兼论《坛经》的版本问题 / 1

净 慧

关于慧能得法偈再探 / 13

净 慧

禅宗六祖得法偈之我见 / 30

田光烈

“心镜”考 / 66

孙昌武

陈寅恪《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》证补 / 83

邓文宽

慧能嗣法“偈”辨析 / 87

胡京国

神秀、惠能偈颂辨析 / 101

[加拿大]李润生

《坛经》神秀偈 / 119

刘楚华

《坛经》与般若思想 / 134

姚卫群

《坛经》的般若思想 / 146

济 群

略论慧能禅学三无观念实质 / 158

胡晓光

说“无念为宗” / 165

冯焕珍

敦煌本《坛经》的佛经引述及其在

慧能禅法中的意义 / 200

杨曾文

《维摩诘经》思想对《坛经》

思想之影响 / 226

[韩国]金尧炫

《坛经》中的不二思想及其在

慧能禅法中的意义 / 256

法 缘

- 慧能禅学的经论依据 / 284 董 群
- “风幡不动”解 / 307 张建木
- 风动幡动会疏 / 312 [香港]陈沛然
- 简论《六祖坛经》的无相忏悔
- 兼谈唐代禅宗忏法体系的形成 / 327 湛 如
- “无相戒”研究 / 346 崔正森
- 论禅宗无相戒的源流 / 354 圣 凯
- 惠能的“三科”“三十六对”思想研究 / 383 孙亦平
- “烦恼即菩提”浅说 / 396 李淑璧
- 关于《坛经》“西方极乐世界”的解说 / 404 阎孟祥
- 读《六祖坛经》之一得 / 412 李豫川
- 六祖慧能和《法宝坛经》 / 423 蔡惠明
- 法衣与《坛经》
- 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
- 中国化历程 / 434 魏德东 黄德远
- 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
- 付法藏系统 / 444 王邦维
- 《坛经》与现象学 / 460 李玉梅
- 《坛经》与《忏悔录》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/ 473 章立明
- 法海本《坛经》的美学意蕴 / 490 王振复
- 《〈六祖坛经〉白话译义》序
- 兼论六祖的禅宗思想体系 / 513 徐恒志
- 佛学新讲禅风重振
- 试评星云大师《〈六祖坛经〉讲话》 / 519 彭 彤

关于慧能得法偈初探

——兼论《坛经》的版本问题

净 慧

《坛经》是禅宗六祖慧能(638~713)的语录,由他的门人法海结集而成,为研究慧能思想的根本典籍。《坛经》问世之后,即有多种本子同时存在,其间虽有详略之分,但无真伪之别。自从本世纪初发现了敦煌写本《坛经》,因其内容与现行几种版本的《坛经》有不少出入,于是在中外学者间出现了肯定敦煌本《坛经》而否定其他版本《坛经》的倾向。有的说:“在《坛经》各本当中的敦煌本为最古,它是后来各本《坛经》的基础。”(宇井伯寿著、杨曾文译:《坛经考》,载1980年第4期《世界宗教资料》),有的说:“敦煌写本《坛经》是《坛经》最古之本”(胡适:《神会和尚遗集》卷首第10页)。还有的说:“最初《坛经》只有一个本子,就是法海当时的记录本,也就是后来的《敦煌写本》”;并贬斥敦煌本以外的《坛经》都“搞了一些画蛇添足、贩运私货的勾当。”(见《隋唐佛教》第534、535页)等等。

“敦煌写本”《坛经》当真就是慧能所说、法海所记的《坛经》“最古”、“最初”的范本吗?从尊重历史和尊重事

实的观点出发,我认为不能那样下结论。

我们先从《坛经》版本的历史源流,看看敦煌写本《坛经》是不是“最古”、“最初”的本子。

慧能的《坛经》,除了敦煌本之外,还有“惠昕本”(公元 967 年刊)、“契嵩本”(公元 1056 年刊)、“德异本”(公元 1290 年刊)和“宗宝本”(公元 1291 年刊)等。惠昕等人都说他们所刊《坛经》是根据一种“文繁”的“古本《坛经》”“校讎”编定的:

一、惠昕在《六祖坛经序》里说:“故我六祖大师,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,总令自悟成佛,目为《坛经》,流传后学。古本文繁,披览之徒,初忻后厌。余……于思迎塔院,分为二卷,凡十一门,贵接后来,同见佛性者。”(见 1944 年《普慧大藏经》本第 1 页)其时在宋太祖乾德五年(967),上距慧能入寂之年(713)254 年。

二、宋郎简《六祖坛经序》说:“六祖之说,余素敬之。患其为俗所增损,而文字鄙俚繁杂,殆不可考。会沙门契嵩作《坛经赞》,因谓嵩师曰:若能正之,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。更二载,嵩果得曹溪古本,校之勘成三卷,璨然皆六祖之言,不复谬妄。”(同上,第 3 页)时在宋仁宗至和三年(1056),上距惠昕本 99 年。

三、德异《坛经序》说:“惜乎《坛经》为后人节略太多,不见六祖大全之旨。德异幼年尝见古本,自后遍求三十余载,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,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。与诸胜士,同一受用。”时在元至元二十七年(1290)距契嵩本 234 年。

四、宗宝的《坛经跋》则说他“见三本不同,互有得失,

其版亦已漫灭，因取其本校讎，讹者正之，略者详之，复增入《弟子请益机缘》，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”。宗宝本与德异本仅一年之隔，上距慧能入寂之年 578 年。

从以上四条历史资料中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，即：从慧能圆寂到宗宝《坛经》问世的 578 年间，《坛经》的发展演变不像中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是个由简到繁的过程，即敦煌本——惠昕本——契嵩本——宗宝本等；而是一个由繁到简，又由简复原的过程，即古本（或曹溪原本）——惠昕本（或类似之本）——敦煌本（或类似之本）——契嵩本（复原本）。这个由繁到简、由简复原的过程，通过对资料的考察，证明它实际上是存在的：惠昕说“古本文繁，披览之徒，初忻后厌”。郎简又说《坛经》为“俗所增损，而文字鄙俚繁杂，殆不可考。”如此说来，郎氏所见之本，很可能就是一种类似后来敦煌发现的本子。契嵩获得的“曹溪古本”，“璨然皆六祖之言”，应当相信郎简的话是可信的，不会是“诡称”。从惠昕到契嵩，都说他们见到过曹溪古本《坛经》。我们知道，曹溪是慧能生前安禅、开法、传衣之地，也是他身后衣钵、真身所在之处，而且集录《坛经》的法海就是曹溪（曹溪在今广东曲江县境内）本地人，《坛经》也是在曹溪结集的。在曹溪或者邻近的地方发现“曹溪古本”《坛经》，完全是情理中事。我们不能想象，慧能的门人能够千方百计地保存慧能遗存的衣钵、真身等法物，而不同时珍藏慧能惟一的开示——《坛经》原本。

此后，元代的德异又慨叹《坛经》为后人节略太多，不见六祖大全之旨。他幼年时曾经见过古本《坛经》，自后

遍求三十余载,才寻到全文,刊于吴中休休禅庵。德异所见的是哪种“节略太多”的《坛经》,是惠昕本,还是类似现在所传的敦煌本?无从知其详细,也有可能就是后者。因为类似现在所传的敦煌本《坛经》,在当时虽未刻板,但在人间抄录流传是有可能的。在德异刻印《坛经》的同时,宗宝也在粤中根据三种不同版本的《坛经》进行校讎,使“讹者正之,略者详之”。宗宝据以校讎的本子,从他的《跋》文看,可能是契嵩校勘过的“曹溪古本”或“曹溪原本”。

从慧能圆寂时起到宗宝本《坛经》的问世,有文字记载发现的古本《坛经》就有四次之多。被英人斯坦因携去的《敦煌写本〈坛经〉》,至1928年前后始由日人矢吹庆辉将其影印本寄赠胡适,距慧能的寂年已经1251年了。据宇井伯寿的研究,敦煌写本《坛经》,“从笔体来看当是唐末宋初(公元960年前后)的”遗物。资料证明,就在敦煌简本传抄的同时,惠昕已经发现了“文繁”的古本《坛经》。我不知道有关学者凭什么理由只肯定距慧能逝世1250多年后发现的敦煌写本《坛经》才是《坛经》的“最古”、“最初”的本子,而否定那些在慧能逝世后二百年到五百年间几次发现的《坛经》古本都是“自欺欺人”的“私货”?在地处曹溪万里之遥,时距慧能千载之后,犹能在鸣沙石室发现一本残缺不全、错字连篇的写本《坛经》,试问:在六祖禅宗风行之地、慧能真身衣钵所在之乡,惠昕、契嵩等人在六祖逝世后二、三百年中,就几次发现过内容翔实的“古本”《坛经》,这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?凭什么还厚诬惠昕以下各本是“画蛇添足”、“贩运私货”呢!敦煌本

《坛经》既是唐末宋初之物，其中又明明写有四代相传的人名，又怎么能说是“最初”的原文呢？

从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料看来，在曹溪或者在它邻近的地区，确实是存在一种“文繁”的古本《坛经》的（有时称为“曹溪原本”）。这个事实不但已经从《坛经》本身流传的历史记载中找到了正证，还可以从宋以前的禅宗史料中找到旁证。

一、现存禅宗史料最早提到《坛经》的人大概要算南阳慧忠（卒于 775 年）禅师吧。他说：“吾比游方，多见此色，近尤盛矣。聚却三五百众，目视云汉，云是南方宗旨，把他《坛经》改换，添糅鄙谈，削除圣意，惑乱后徒，岂成言教？苦哉！吾宗丧矣。”（《传灯录》卷二八）慧忠发出这些慨叹大约是在慧能逝世以后 50 年左右，可能指的是南方禅门的情况。

二、韦处厚（卒于 828 年）作《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》说：“在洛者曰会，得总持之印，独耀莹珠。习徒迷真，橘枳变体，竟成《坛经》传宗，优劣详矣。”（见《全唐文》卷七一五）这是指慧能寂后 100 年左右中原地区禅门里发生的情况。

这两条资料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两个事实：一是在慧能逝世后即有《坛经》行世，二是在《坛经》行世之后就有“添糅鄙谈，削除圣意”，“橘枳变体”等现象发生；特别是可以澄清一个问题：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，惠昕是“篡改《坛经》的始作俑者”（《〈坛经〉对勘》第 8 页），而是在惠昕发现“古本”《坛经》的 200 年前就有人“把他《坛经》改换”，使得“橘枳变体”。

由此可见,传抄于唐末宋初(960年前后)的敦煌本《坛经》,并非《坛经》“最古”“最初”的原本,不是已经非常明白了吗?然而使人迷惑不解的是,国内外研究《坛经》的学者一方面用惠昕以下各本来改正敦煌本的错字漏句——这无疑是正确的;可是另一方面,当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在内容上有出入时,就认为只有敦煌本才是正确的,其他各本的内容只要敦煌本所没有的,就都是“恣意篡改”、“贩运私货”!这种态度就有欠公正了。如果没有惠昕以下各种版本的《坛经》流传于世,我们今天要想补正敦煌写本《坛经》的漏句错字,要想如实地了解慧能的生平和思想,那是不可想象的。

正像以上资料已经证明了的那样,我认为《坛经》除了敦煌本、惠昕本、契嵩本之外,还有一种“曹溪古本”《坛经》存在过(至少元代以前是这样),这个本子很可能就是现存的“曹溪原本”。怎样看待这个问题,我觉得只要冷静而客观地考察,“曹溪原本”的来龙去脉,一定会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。

其次,有的学者根据敦煌本与流通《坛经》之间在内容上的某些分歧,提出了对慧能思想的不同看法。笔者学业荒疏,本来不敢献曝,但又觉得其中有的问题还有议一议的必要,并借此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关于“本来无一物”的问题。慧能在黄梅“得法偈”,敦煌本《坛经》作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佛性(性)常清净,何处有尘埃!”惠昕本以下各种版本的《坛经》均作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有(“有”亦作“惹”)尘埃!”(《祖堂集》)卷二作:身非菩提树,

心境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？)

这首偈语是慧能思想的集中体现，对研究慧能的思想和他所倡导的南宗禅来说，它的每一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。然而敦煌本与其他版恰恰在这个关键性的字句上出现了分歧，真有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之感。因此，有的学者就认为是“惠昕带头，把‘佛性常清净’，篡改改为‘本来无一物’”的。并说“这是从思想上对慧能作了根本性的篡改：‘把‘佛性’论者的慧能，篡改为虚无主义者，从而为以下更多更大的篡改，作了极为恶劣的开端。而且，以后随着契嵩、宗宝本的广泛流通，这首‘本来无一物’的篡改偈文，竟然取代了‘佛性常清净’的偈文，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人所共知的偈文。致使千百年来，以假当真，真伪不辨。这项篡改，始作俑者是惠昕，而广为流传、张大其影响者，则是契嵩和宗宝。”(见《〈坛经〉对勘》第19页)要回答这首偈文的第三句究竟是敦煌本的“佛性常清净”是慧能原话，还是惠昕以下各本的“本来无一物”是慧能原话这个问题，笔者以为应该从历史资料和慧能思想两方面进行考察。

在惠昕本《坛经》还没有问世之前70年圆寂的仰山慧寂(814~890)提到慧能“得法偈”时其第三句就不是敦煌本的“佛性常清净”，而是和其他各种版本《坛经》相一致的“本来无一物”。此事载于《祖堂集》卷18；同书卷2《弘忍和尚》传所录第三句亦同。黄檗希运的《宛陵录》(公元857年成书)中也有“本来无一物”(见《大正藏》第48卷第385页中)的语句。说明这句话在《坛经》的“曹溪原本”中本来就是如此，只是到了敦煌本才改成了“佛性常

清淨”的。

历史的事实是那样有力地证实了“本来无一物”并非由于惠听的“带头”“篡改”才出现在《坛经》里的。那么，这句话是否同慧能的思想相一致呢？这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的另一方面。中外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，认为“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”（《坛经》各本均有此语）是慧能思想的基本点。一部《坛经》千言万语，都是在发挥他的这个基本思想。他的“得法偈”同他的“三无”思想是一脉贯通的。慧能有资格继承弘忍的衣钵并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放异彩，这首以“本来无一物”为核心的“得法偈”是其起点。

二、关于“本来面目”的问题。近有学者在评论《坛经》里关于惠明在大庾岭头闻法得悟的公案时说：“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慧能居然对惠明说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’！这又是（契嵩）宗宝等人在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！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史的人都知道，所谓‘哪（前作“那”，此作“哪”，原文如此——引者）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’这类的话，乃是出现了所谓‘话头禅’（也叫“看话禅”）以后才有的诳禅行话。慧能时还不会有这种语言。”并说这是契嵩、宗宝等人，“不顾历史事实，把在慧能以后才出现的东西，硬往慧能嘴里塞，实在是一种既荒谬又恶劣的作法。（契嵩）宗宝等人还说，惠明在听了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混话之后，便‘言下大悟’，自然也是一种纯粹的瞎扯！”（见《隋唐佛教》第538页）又说：“这是契嵩带头把出现了所谓‘看话禅’（也叫“话头禅”）以后才有的一些货色硬塞进《坛经》里去的一

种明显的作伪行径!”(见《〈坛经〉对勘》第27页)

我们知道,“看话禅”^①是南宋大慧宗杲(1089~1163)提倡的一种参禅方法,而明教契嵩(1011~1072)校勘《坛经》是在大慧还没有出生的北宋时代,具体的年代是公元1056年,他不可能预见后人会提出“看话禅”来,事先在《坛经》里造舆论、打埋伏,使“看话禅”有经可据而成为合法的东西。那么契嵩本以下各种版本的《坛经》(其实惠昕本也有同样的字句,只是以小注的形式出现罢了)有关惠明公案的那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?笔者认为那段话是《坛经》的“曹溪原本”里本来就有的东西,敦煌本《坛经》只不过是《坛经》一种“节略”本,为了抄写、诵持、传宗的方便,就把那些在“节略”者看来无关重要的内容删去了。试据宋以前的禅宗典籍就这个问题作些说明。

前面已经提到的黄檗禅师(?~855)《传心法要》一书,记载了裴休于唐会昌二年(842)、大中二年(848)两次请益的内容。当时裴休提的许多问题中便包括了著名的惠明公案在内,黄檗是这样回答裴休的:“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,六祖便问:汝来求何事?为求衣?为求法?明上座云:不为衣来,但为法来!六祖云:汝且暂时敛念,善恶都莫思量。明乃禀语。六祖云:不思善,不思恶,正当与么时,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!明于言下忽然默契,便礼拜云: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!”(见《大正

^① 《传心法要》说:“若是个丈夫汉,看个公案!僧问赵州:狗子还有佛性也无?州云:无!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,昼参夜参,行住坐卧,著衣吃饭处,屙屎放尿处,心心相顾,猛著精彩,守个无字,日久月深,打成一片,忽然心花顿发,悟佛祖之机,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。”“看公案”即“参话头”。可见此法在唐代即已流行。

藏》第48卷第383页下)按《传心法要》集成于唐大中十一年(857)、比敦煌本《坛经》传抄的时间约早近百年,比契嵩本早199年,比看话禅提倡者宗杲的卒年早306年,比宗宝本早434年。

在前面引用过的另一部禅宗史籍《祖堂集》(公元952年成书)卷2《弘忍和尚》、卷18《仰山和尚》等处都提到过这则公案,其答问的语名同流通本《坛经》基本一致的:“行者(慧能当时尚未出家)见苦求,便即与说,先教石上端坐,静思静虑:不思善,不思恶,正与摩思不生时,还我本来明上座面目来!”

可见,大庾岭头惠明闻法得悟公案的内容,并非契嵩等人“硬塞进《坛经》里去的”“私货”,也不是“看话禅”出现以后才有的“逛禅胡话”,而恰恰是《坛经》的“曹溪原本”里固有的东西,所以它才有可能被唐代禅师们广泛地加以引用。笔者认为“不思善,不思恶”这个提法的本身,是与《金刚经》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、《坛经》“无念为宗”等观点一致的,是离言绝虑的无差别境界。

敦煌本《坛经》不是最古、最初的《坛经》,还可以提出若干问题来加以考察。但是,只要把有关的历史和基本思想弄清楚了,证明在历史上确实有过“古本”《坛经》存在,敦柏本并非《坛经》的“最古”、“最初”的原本和“基础”,惠昕以下各本与敦煌本的某些内容不同,不是惠昕等人硬塞进《坛经》里去的“私货”,这样,本文的任务也完成了,某些学者强加在惠昕、契嵩等人身上的“不白之冤”,也就“平反昭雪”了。

但是,笔者认为敦煌本《坛经》是经过“传宗”而“橘枳

变体”的产物,这是否意味着一桩新的“冤案”正在产生呢?不会的,笔者自信所下判断都是有根有据、实事求是的。敦煌本《坛经》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,那就是一再强调要用《坛经》作为“南宗弟子”“递相传授”“以为禀承”的“依约”。被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分为五十七节(《隋唐佛教》的作者说:敦煌本《坛经》“一卷,不分品目,但分五十七节”,似乎它原来就是如此;其实《大正藏》著录的敦煌本并未分节)的敦煌本《坛经》,一共有七节(即第一、三、八、四七、五一、五五、五六、五七节)说得“不得《坛经》,即无禀受”、“无《坛经》禀承,非南宗弟子”这一类传宗付嘱的话,并且列有四代(惠昕本有五代)相传的人名。很难想象,在那些不重视文字的禅者辗转传抄的过程中,不发生随意取舍的情况。韦处厚之所以慨叹用“《坛经》传宗”的“习徒迷真”,使“橘枳变体”,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《坛经》敦煌本里有那么多“传宗禀受”的内容,也不是偶然产生的。慧能的南宗禅首先主要流传在广东、湖南、江西等地,随后又传播到长江、黄河流域。在南方几省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的许多大禅师传承不替,风行草偃,没有人出来否认他们的“法统”。但是,中原地区原是北宗禅盛行的地方,已立神秀为六祖、法如为七祖。神会一系在北宗禅化导的地区宣示南方宗旨,并进而确立慧能的祖位,又无“信物”(初祖至六祖都是传衣表信的),因此,他们就拿出《坛经》来作为“付法”的凭证。当时还没发明印刷术,加上禅师们受了“诸佛妙理,非关文字”风气的影响,从实用的目的出发,就节略原本《坛经》的要义,“递相传授”,“以为禀承”的“依约”。敦煌本《坛

经》就是当时作为“传法”用的许多同样的本子中被无意地保存下来的一种。当然,这样说,丝毫没有贬低敦煌本《坛经》的价值的含意,只是想说明一下不要“迷信”敦煌本。同时,像敦煌本那样的节略本《坛经》的出现,也是不足为奇的,僧徒为诵习方便起见,节抄佛经的事早已存在。

(原载《法音》1982年第2期)

关于慧能得法偈再探

净 慧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

这首载于《六祖坛经》等禅籍中的偈语，自从公元 661 年慧能在黄梅弘忍禅师会下唱出以来，历时 1300 多年，一直在中国佛教史、思想史上广为传诵，脍炙人口，并随禅宗文化一起传播到朝鲜、日本等友邻国家，成为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之一。1922 年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，发现了一本斯坦因从我国敦煌千佛洞窃去的“敦煌本”《六祖坛经》，其内容与通行本《坛经》有不少出入，于是引起了中日学者的注意，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热烈讨论。对于敦煌本《坛经》的是是非非，几十年来不少博学之士进行过颇有价值的探讨，有大量论文和著作问世。《坛经》的通行本和敦煌本一共不过三万多字，而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研究《坛经》及慧能历史的文章，其字数恐怕要超出《坛经》的几十倍以至上百倍。这种学术盛况，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上罕有其匹。笔者对此亦每有触发，因不揣浅陋，

于1982年写过《〈敦煌写本坛经〉是“最初”的〈坛经〉吗?》(载《法音》1982年第2期及香港《内明》杂志151期)。我仍坚持那篇文章的一些基本观点。本文只想就敦煌本《坛经》所载慧能得法偈的问题,再作一些探讨,以就教于教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。

敦煌本《坛经》慧能得法偈的全文是:

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无台,佛性(性)常青
(清)净,何处有尘埃。

(见《〈六祖坛经〉诸本集成》第8页)

偈语的第三句,通行本《坛经》及有关禅籍均作“本来无一物”,而敦煌本却作“佛性常清净”。究竟谁是谁非,学术界暂时还难结案。笔者拟从慧能得法偈的针对性、慧能接引学人说法的特点和慧能思想的广延性三个方面加以探讨,以辨是非。

(一)

首先,我们都知道有了神秀的呈心偈才引出了慧能的得法偈。也就是说慧能的得法偈是有针对性的,是有所为而发的。神秀的呈心偈是:

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莫使有尘埃。

慧能秉吹毛剑,斩断葛藤,与神秀的呈心偈针锋相对,雄狮一吼,来了个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;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的千古绝唱,结果是编氓樵子受衣钵、承法统;獼猴径登佛地,文盲直绍祖灯。这是佛教历史上空前绝后、震古铄今的一件大事。这个伟大奇迹的产生,